

## 引 言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度，她悠久的历史 and 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积淀，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使她在前进的路途上越来越步履维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敢于冲破先王法度、试图进行因时损益的改革之士。一个世纪前由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即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他们发动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

农历戊戌年达到高潮的这次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以致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爆发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自谋独立富强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它无可挽回的失败了，但毫无疑问它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并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 一 风雨如磐

### ——民族危机的加深

公元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上一年 7 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经过半年多的激战，最终以清朝军队全面败绩而告终，李鸿章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淮军望风披靡，北洋海军毁于一旦，清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在极不平等的条约上签字，以牺牲巨大的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屈辱的和平。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议和全权代表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与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今下关）签订了结束这次战争的中日《马关条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辽东半岛后被“赎回”），中国赔偿日本军费 2 亿两白银，中国允许日本在中国通

商口岸设立工厂、输入机器等。《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为苛刻的丧权辱国条约，从此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中又深陷了一大截。

## 1. 瓜分豆剖的危机

资本输出给中国带来的更大的灾难，是它引发了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争相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争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狂潮。其前奏曲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辽东半岛是要与台湾岛等一起割让给日本的。一直企图独霸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首先反对，法、德两国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也附和俄国，要求日本退回辽东半岛，并陈兵日本海面，用武力相要挟，日本无力与三国抗争，只得借机向清政府敲诈了 3000 万两的“赎辽费”。俄国带头“干涉还辽”成功，遂借机向清政府索要“报酬”。清政府出于“以夷制夷”的幻想，对俄国也颇有好感。1896 年，俄国趁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机，诱迫清政府派重臣李鸿章为专使赴俄庆贺，经过秘密

谈判，双方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主要内容为：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通达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表面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盟约，实际上，俄国是借“共同防日”的幌子把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地区。之后，中俄又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规定俄国在铁路沿线有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把这一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正式拉开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狂潮帷幕的是德国。1897年11月中旬，德国以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不久，俄国即在12月中旬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借地，租期99年，山东全省则成为其势力范围。同年3月27日和5月7日，俄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旅大租地

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以及附近海面成为俄国的租借地，租期 25 年，辽东半岛和东北全境则成为其势力范围。

继俄、德之后，1898 年 4 月，法国胁迫清政府同意租让广州湾，并于 1899 年 11 月 6 日正式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成为法国的租借地，租期 99 年，而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则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要求租让九龙半岛，并于 1898 年 6 月 9 日强迫清政府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以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成为英国的租借地，租期 99 年。英国又于 1898 年 7 月 1 日强迫清政府订立《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海湾连同刘公岛和威海卫沿岸 10 里宽的地段的租借权。此前不久，英国已迫使清政府允诺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整个长江流域成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在割占台湾后，继续趁火打劫，于 1898 年 4 月 22 日强迫清政府允诺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为其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很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地对人说：“二十年无事，总可

得矣。”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打碎了他的美梦，证明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包藏祸心的俄国，很快就在瓜分狂潮中露出了它的狐狸尾巴。（中俄密约）的签订，不但没有保证“二十年无事”，连两年无事都没有保证。转瞬之间，祖国的大好河山即横遭肢解，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机。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古老的“以夷制夷”法宝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想在列强环伺、合而侵华的险恶环境中生存下去，只有变法维新，改弦易辙，发愤自强，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 2. 午夜惊雷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的震动是巨大的。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即有着友好的交往。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郭沫若曾填《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词一首，上阕云：“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鉴真是唐代中国高僧，应日本佛教界邀请赴日传律授戒，5次东渡，均因风狂浪恶未能成功，

直到 753 年才搭乘日本遣唐使的船到了日本，这时他已 65 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晁衡是日本留唐学生，留中国 50 余年，并曾在唐朝做官，官至节度使。他与大诗人李白交往甚密。一次，李白听说他在回国途中船毁人亡，十分悲痛，并作诗哀悼，诗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孤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在两国当时的交往中，日本是毕恭毕敬的小学生，通过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日本吸收了中国的许多东西，包括土地制度、法律、思想、宗教、文学以至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和习俗。例如：日本的文字由汉字和主要借自汉字偏旁的假名组成，日本的和服仿自唐代中国人的服装，日本人席地而坐本是宋代以前中国人的习惯，日本的茶道是中国古代饮茶方法的继承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因此，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一般的日本国民对中国仍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而在中国，除一些了解彼此实力的人如李鸿章外，大多数人都把日本看作不足畏惧的“倭奴”，甚至连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也说：“战事既成，日舰必大受创。若以中国必欲力战而言，则出其全力，直可支持 100 年之久，依然

物产丰繁，各事具备，无须外人之臂助也。”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预料，小小的岛国竟一举打败了老大的帝国，消息传来，如午夜惊雷，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动。吴玉章回忆说：“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因而，“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琨）曾经痛哭不止”。当时“痛哭不止”的又何止吴玉章兄弟！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又有谁不为之震惊、不为之痛哭呢？康有为说：“日人内犯，致割地赔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

震惊、痛哭之余，中国该怎么办？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正是甲午战争带来的震惊和思考，加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爆发。

## 二 “圣人为”异军突起

### ——早期维新思想和 康有为的崛起

#### 1. 锋芒初露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理学世家，自幼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从6岁起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康有为少年老成，儿童的天性本来是活泼好动的，而他却小小年纪就“不苟言笑”，“有志于圣贤之学”，因而“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

1876年，年轻的康有为投在朱次琦门下

求学。朱次琦是当时著名学者，学问渊博，诲人不倦。朱次琦在学术上“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这种“通经致用”思想对康有为有深刻的影响。在他门下，康有为了了解了数千年的学术源流，得以融会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但是康有为并不满足于“通经致用”的思想。据他自己后来回忆，1878年秋冬之际，他对中国的“要书大书”已经有了大概了解，这时他对整天埋头于故纸堆中产生了厌烦情绪，开始“日有新思”。他想，那些著名的考据学家，如戴震虽然学问渊博，“著书满家”，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绝学捐书”，不再读书，而是闭门谢客，“静坐养心”。静坐时，他“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反映了康有为当时彷徨、苦闷和无所依归的思想心态。

抛弃了传统的安身立命之学的康有为并没有马上找到更先进、更科学的学说。他的思想离开了读书人传统的道路，却紧接着陷入了佛、道的迷宫。他辞别朱次琦后，移居到南海西樵山白云洞，绝交闭户，潜心研究佛经、道经，进入了一种虚幻缥缈、想入非非的境界。这种苦心研读对他以后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1879年，康有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这一邂逅彻底改变了他人的人生道路。从张鼎华那里，他“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从此，他茅塞顿开，“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因感念民生艰难，于是“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此后，他开始阅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印行的《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及当时翻译出版的有关西学的书籍。与此同时，他又有机会去了一次香港，第一次看到了“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才知道“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从此，西学进入了他的视野，像磁铁一样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1882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途经上海时，又亲眼目睹了这座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正在经历着的巨大变迁，“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从此，他不再苦闷，不再彷徨，开始“尽释故见”，“大讲西学”，对声、光、化、电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各国史志等均有涉猎，并“俛读仰思，日有大进”。

1888 年，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此时正值奉天（今辽宁省）发生水灾，康有为以此为契机，拟了一份条陈，准备呈递给光绪帝，这就是他的“上清帝第一书”（百日维新前，康有为共有 7 次上书），请求清政府实行变法。在这份条陈中，他首先陈述了列强侵逼中国的现状，指出俄国筑铁路而迫盛京（今沈阳）于北方，英国侵缅甸而西藏及川、滇于西南，法国以越南为跳板而图滇、粤，日本也在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将要吞并朝鲜而窥伺中国。他针对当时朝政弊端，提出了如下变法主张：变成法，即改变旧的不合时宜的政策；通下情，即下情上达，广泛听取意见，择善而用之；慎左右，即皇帝要选用忠良之臣，罢斥佞臣。他还要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作自我批评，“下诏罪己，及时图治”。他这个条陈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可惜的是并未能呈递到最高统治者手上。原因在于，康有为当时还只是一介秀才，没有资格直接上书言事，他的条陈需要请人代递，而且由于他在条陈中用语尖刻，没有人敢替他代递。尽管如此，这次上书是康有为在政治上第一次崭露锋芒，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和政界人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2. 创立“托古改制”理论

1890年春，康有为移居广州云衢书屋。这时，一个叫陈千秋的学海堂学生慕名来访，相见之后，对康有为大为钦仰。这年秋天，陈千秋告诉同学梁启超，说康有为的学说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梦见过的，这回可算遇上真正的老师了。梁启超比康有为小15岁，但因是举人，很有些自命不凡，而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但是，一经交谈，梁启超大受震动。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见到康有为的情形时说，他们辰时（上午7~9点）人见康有为，到戌时（晚上7~9点）才告退，康有为的理论对他来说就好像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使他顿时“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以至“竟夕不能寐”。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把他“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一条条予以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第二天梁启超再去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乃教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启超自此“决然舍去旧学”，从学海堂退了学，转而拜康有为为师。梁启超坦承“生平知有学自兹

始”。在梁启超、陈千秋的请求下，康有为乃于 1891 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开始执鞭教学，梁启超、陈千秋则成了他最早的学生。

从 1891 年到 1894 年这 4 年间，康有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聚徒讲学，二是著书立说，二者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既培养了维新人才，又建立了他的维新思想体系。

聚徒讲学。康有为开办学堂，追求新知的青年学子闻风而来，联翩不断，次年即达 40 多人。康有为招收弟子，并无正式的考试，而是与想来就学的人面谈，专门吸收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又能接受他的学说的人。康有为为学堂制订《长兴学记》以为学规。在授课内容上，康有为贯彻的是以孔学、佛学、宋学（即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原则，宗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授课形式除了讲授外，主要是让学生自学。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在万木草堂，我们除听讲外，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人草堂，第一部分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达百数十种。他还设立了

“功课簿”制度，就是给学生们每人一本功课簿，学生凡读书过程中产生的疑问或心得都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亲自批答。他把这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一条简短的疑问，往往写出长篇的批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 4 年多时间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敞开思想，无所顾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启发学生们同他本人一道探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开创了一派新的学风，使原来埋头于八股制艺的青年学子，变成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热血青年。数年间，康有为培育了很多维新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韩文举等，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梁启超，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并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至人们往往“康梁”并称。维新运动活跃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湖南、广东等地，都有万木草堂的学生。

著书立说。即构筑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今文经学。所谓“今文经”，是指西汉初年由一些儒生所传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儒家典籍，而后来发现的一些用先秦六国文字写成定本的儒家典籍则被称为“古文经”。今、古

文经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经书的解释不同：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比较朴实；今文经学则主张探索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思想比较活跃。1889年，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读了廖平的《今古学考》一书后，深受启发。今文经学阐发圣人“微言大义”的主张的灵活性和神秘性不正可用来为维新变法张本吗？他心胸顿时豁然开朗，一头扎进今文经学，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根据，很快便硕果累累，这就是他在弟子们协助下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

（新学伪经考）是1891年刊行的，由陈千秋、梁启超协助完成。这儿的“新学”，是指古文经学，“新”是王莽的国号。魏源曾经贬斥汉学（古文经）是伪汉学，而康有为根本就不承认它是汉学。他认为，古文经根本就不存在，今文经就是孔子留传下来的真经，所谓“古文经”，是汉代的刘歆伪造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目的是为王莽篡夺汉位制造舆论，湮乱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因而，古文经学不应称为汉学而应称为“新学”，它不是“真经”而是“伪经”，他作《新学伪经考》，就是要彻底推翻、批判旧古文经的伪说，发扬今文经学阐释孔子之道的微言大意，保卫孔学。从形式上

看，这是一部考证辨伪的学术著作，其中并未涉及政治问题，而且书中也一再声明是为了维护“孔子之道”，实际上，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政治著作。从学术上看，书中有不少臆想、武断之处，如说后世出土的钟鼎彝器都是“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他这部著作却是震聋发聩的。首先，他把自东汉以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统统说成是“伪经”，对清代正统的官学（汉学和宋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的绝对权威和由它造成的“本应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死气沉沉的局面，而且从根本上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其次，他在该书中否定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重在“记事”）的主张，主张探索孔子的微言大义，是对当时保守知识分子的挑战，给知识界以思想上的极大震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这实在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实际上，这是一部披着学术外衣、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著作。正因为如此，守旧派大哗，予以猛烈抨击，清政府也先后三次下令将该书毁版。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目的在于否定历代